

## 第七章 結 論

所謂的「政黨輪替」，是指選民在國家最高行政首長選舉中，多數投票給非執政黨候選人，造成非原執政黨人當選的情況。總統制政府下的美國，多數選民在一九九二年投票給民主黨的柯林頓，擊敗共和黨老布希並取得執政權；內閣制政府下的英國，多數選民在一九九七年，因對梅傑執政的保守黨政府不滿意，投票給工黨的布萊爾，並由工黨取得執政，由此可知，政黨輪替執政在西方民主國家已屬常態。對於本文研究對象，台灣與墨西哥，其代表的意義有二：首先，一九七〇年代晚期之後開啓的第三波民主化國家，在威權體制國家得以達成政黨輪替，其代表的意義是威權體制轉型為民主體制的里程碑；其次，台灣與墨西哥在威權政體民主轉型後完成政黨輪替，特別值得其他國家進行民主轉型的借鏡。本文研究重心焦點集中於選民的投票行為如何造成政黨輪替？在研究主題方面：主要探討台灣與墨西哥選民為何在二〇〇〇年選擇支持在野黨完成政黨輪替。筆者除了考慮人口學變項作為控制變項外，並運用政黨重組、候選人評價與重大議題當作自變項投入模型進行分析。在進行模型分析前，先探討政黨重組、候選人評價與重大議題及其他議題等變數對選民投票的影響。在研究方法與使用資料：結合比較研究與調查研究法進行分析，在比較研究方面，結合最大相似比較研究法與最大相異比較研究法進行兩國之間的比較；在使用資料方面：除運用總統大選選後面訪資料進行模型分析比較外，更藉助兩國歷年的投票資料、面訪資料、電訪資料，進行輔助說明。最後則討論台灣與墨西哥在二〇〇〇年總統選舉選民投票政黨抉擇的影響，進而評估產生政黨輪替的可能性。

### 第一節 研究發現

臺灣與墨西哥威權統治政權之執政黨，政黨內部分裂成兩股政治勢力，是影響本次總統選舉的重大事件，執政黨內部分裂給予主要反對黨獲勝的大好機會。在臺灣，宋楚

瑜在一九九九年宣布退出國民黨，改以獨立候選人參選總統大選，儼然已成國民黨與民進黨以外的第三勢力；在墨西哥，卡德納斯在一九八七年即脫離革命建制黨，並於一九八九年結合其他勢力成立民主革命黨，成為墨西哥的第三勢力。臺灣與墨西哥兩國在二〇〇〇年總統選舉的競爭型態，同樣形成分裂的執政黨對抗團結的反對黨。在這種情境下，選舉結果呈現主要反對黨在三方競爭的氛圍下脫穎而出獲得多數選民的信賴並取得政權。

本研究的目的是在於瞭解選民的投票行為模式，為何會導致台灣與墨西哥政黨輪替的結果。從前面幾章的調查研究發現，政黨重組、候選人評價與重大議題等三個變數，都是台灣選民與墨西哥選民在決定總統選舉投票對象時，不可或缺的解釋因素。筆者最後將分析比較上述三個變數對選民投票行為的決定因素作用力大小。本文經過深入研究有幾個重要發現：

## 一、政黨重組與政黨輪替

政黨體系若發生重組現象，政黨實力分佈會出現消長，長期而言就會引發政黨輪替的現象。以下就台灣與墨西哥政黨重組之研究發現進行說明。

### （一）台灣

從政黨重組的研究中發現，政黨重組是否發生的可能原因與現象有四：

#### 1、四十歲以下新世代選民加入，呈現政黨認同分佈認知明顯差異

一九八〇年代至二〇〇〇年，台灣政治發展逐漸鬆綁，政黨政治漸趨制度化發展，四十歲以下的選民，在二十歲左右參與眾多爭取政治權利與自由開放的政治活動，或接觸政治活動的啟發，若以一個世代二十年計算，此世代的選民屬於台灣與墨西哥的新世代選民，新世代選民與舊世代選民具有不同的政治經驗，多數能接受甚至認同反對黨爭取打破一黨獨大與政治自由化運動。因此新世代選民的政治體系認知與政黨認同，明顯

異於舊世代選民的政黨認同。當新世代選民逐漸取代舊世代選民時，台灣的政治體系因新世代選民的加入產生板塊移動現象，就會產生政黨重組的現象。

## 2、省籍差異的舊分歧，衍生統獨立場分佈的新議題

「本省與外省」是長期存在台灣社會的重要分歧，無論是政治面向、社會面向或教育面向，多數學者同意本省族群與外省族群之間，具有著顯著的差異，平均教育成就即是明顯的例子（Tsai and Chiu, 1993；吳乃德, 1997；Wang, 2001；駱明慶, 2001）。在一九八〇年代以前，本省與外省的族群背景與政治資源配置的公平性密切相關。一九八六年解除戒嚴、一九九一與一九九二年國會全面改選之後，本省與外省的省籍認同差異，在兩岸關係的統獨選擇開始凸顯出來，並影響選民的投票抉擇。選民統獨立場選擇所衍生的統獨議題開始成為選舉主軸，在選舉中更引發國民黨與民進黨的對立。讓以省籍為主的族群分歧及統獨議題，成為主導政黨認同分佈變動，或甚至政黨重組的重要元素之一。

## 3、政治世代與地理區域的新分歧

台灣新政治世代與舊政治世代經歷不同的時空環境。在政治世代上，新政治世代對政黨產生不同的認知、價值與偏好。當台灣新政治世代接觸新思潮與新資訊時，逐漸產生新的政黨依附，導致整體政黨認同分佈發生明顯的變動，進而肇生政黨解組與重組。在地域政治上，南部地區人口與族群組成與北部地區有明顯差異，南部地區係以農業為主的經濟模式與鄉村為主的生活型態，北部則是以商業為主的經濟模式及都會為主的生活型態，北部與南部經濟模式與生活形態迥然不同。一九九四年後，台灣地理區域的分佈與政黨認同的重組之間，產生明顯的變化，尤其南部地區的政黨認同分佈，產生明顯由國民黨（藍）轉民進黨（綠）的現象，經由資料檢證發現，地理區域政黨分佈改變並未產生政黨重組的現象。由此可知，政治世代轉移已肇生政黨重組的端倪，意即政黨解組，然而，地域區域因素則未發生政黨重組的現象。

## (二) 墨西哥

從政黨重組的研究中發現，墨西哥已完成政黨重組，而政黨重組的可能原因與現象有四：

### 1、四十歲以下新世代選民加入，產生政黨認同分佈差異

墨西哥政治開放與經濟開放同時進行，從相對封閉經濟體系走向相對開放的經濟體系。國家強制的角色逐漸消退，市場的影響力日益擴張。一九八一年石油價格急遽下滑，造成墨西哥經濟陷入景氣迅速衰退，引發失業率提高、實質薪資下降。一九八二至一九八八年墨西哥經歷一連串經濟危機，造成拉丁美洲眾多負債國所謂的「失落的十年」(lost decade)。<sup>61</sup>在一九八五年墨西哥遭逢大幅貶值所導致的披索危機，隨即採取一系列政治改革措施，逐步確立政黨制度化發展趨勢，新世代選民因而經歷與舊世代選民差異甚大的政治經驗，墨西哥政治體系因新世代選民加入，發生巨大的變化，新世代選民與舊世代選民在政黨認同認知上具有明顯差異(Dominguez, and McCann, 1996: 90-115)。

### 2、意識型態差異的舊分歧，產生是否贊成體制立場差異的新議題

墨西哥過去明顯存在意識型態差異的社會分歧，造成這種分歧的原因，主要來自各政黨的意識型態。一九九〇年代，墨西哥民眾支持的政黨是足以代表現有體制並持續執政的政黨，即革命建制黨。選民執行投票抉擇因素，最重要的考慮因素為人文區位及議題因素。墨西哥選民面臨的兩種力量相互拉拒，第一種力量是選民認為革命建制黨已日益衰弱，並相信在野黨會把經濟帶向成長且維持社會和平，是一種「反對現有體制的力量」；相反地，第二種力量是選民認為革命建制黨勢力逐漸增強，反對黨勢必無法改善經濟狀況，並維持社會和平，意即「贊成現有體制的力量」。因此，卡德納斯所領導的勢力，從革命建制黨裂解而出時，「贊成體制與反對體制」逐漸成為影響整個選民政黨認同分佈的重要因素(Dominguez, and McCann, 1996: 145-175)。

---

<sup>61</sup> Levy and Bruhn with Zebadua, 2001, p. 165.

### 3、政治世代與地域政治的新分歧

經歷二次經濟危機後，在政治世代上，墨西哥開啓一系列的政治改革，新的政治世代接受不同資訊的刺激，讓新政治世代對政黨具有不同的認知、價值與偏好，導致新政治世代的政黨認同產生游移現象，引發政黨認同分佈產生明顯變化；在地域政治上，因為經濟發展所帶來的現代化、工業化，造成地理區域人口組成及人口素質改變，擴大不同區域間的貧富差距，政黨認同分佈相對產生明顯變化。由此可知，墨西哥因為政治世代與地域政治，已產生政黨重組的現象(Dominguez, and McCann, 1996: 107-109)。

## 二、候選人評價與政黨輪替

從候選人評價的短期因素可以發現，本文運用候選人評價變數，必須特定候選人形象在選民心中，各種面向都明顯領先其他候選人，這樣的候選人評價方足以影響選民對候選人排列出明確選擇順序。對候選人形象認知與優劣評價，選民即藉此短期因素決定投票抉擇。當候選人評價這個短期因素發揮作用，多數選民選擇不支持既有執政黨候選人，轉而支持在野黨候選人，最後的結果就是達成政黨輪替。

### (一) 台灣

在討論候選人評價因素前，二〇〇〇年總統大選，執政黨一分為二成兩個政治勢力代表執政的國民黨參選人連戰，與由國民黨裂解而出的無黨籍候選人宋楚瑜。國民黨認同者被迫在不同的菁英間做選擇。在這種情境之下，針對台灣候選人評價的研究發現有三：

#### 1、候選人評價未改變台灣政黨選民基礎

候選人評價這個短期影響因素，對選情產生戲劇性的短期變化，可以預見的是，當短期因素消失後，選民政黨認同分佈結構即恢復原狀，短期因素所造成的變動無法轉換

成穩定的政黨認同分佈結構，這種變化僅能視為選民態度與評價短暫地浮動，或是偏離性選舉。就此而言，選民的政黨認同並沒有經過兩次以上的穩定變動，亦即在二〇〇〇年總統大選前後，台灣選民並未發生政黨重組的現象。

## 2、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評價明顯優於國民黨總統候選人

選民對於民進黨總統候選人陳水扁，或對獨立參選人宋楚瑜的候選人評價，明顯優於執政黨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連戰，「多數選民面對的選擇是陳水扁與連戰選擇其一」或「宋楚瑜與連戰選擇其一」，在這兩組選擇間，選民的評價都具有明顯落差。部分國民黨支持者或獨立選民，會因候選人短期因素而捨原有政黨認同，反以選擇候選人評價優先，轉而支持形象較佳的陳水扁或宋楚瑜。

## 3、候選人評價是造成政黨輪替的因素之一

選舉過程中，候選人會透過不同方法與途徑來強化候選人形象，一方面讓候選人成為選戰環境中醒目的因素，另一方面，反成為選民投票抉擇時的重要依據。當候選人評價成為主導選民抉擇的重要依據時，多數選民為民進黨候選人所吸引且投票支持時，政黨輪替將不可避免。根據本論文，選民對民進黨候選人陳水扁的評價高於國民黨候選人連戰，所以吸引選民投票支持。

### (二) 墨西哥

本文探討墨西哥選民受候選人評價吸引，並給予支持的重要發現有三：從候選人評價的研究中發現，墨西哥因為候選人評價吸引選民支持，研究發現有三：

#### 1、候選人評價未改變墨西哥政黨選民結構

候選人評價因素，未衝擊日趨穩定的墨西哥政黨選民結構，對候選人評價變化僅能視為墨西哥選民的短期變動現象。在二〇〇〇年總統大選時，同樣源自於革命建制黨的

拉巴斯迪達，及民主革命黨的卡德納斯共同競逐同質性甚高，且意識型態中間偏左的選民，在目標群體有限的情況下，因拉巴斯迪達與卡德納斯同時參選，選民被迫從兩者之中進行選擇。此外，更有對革命建制黨不滿，轉而把國家行動黨的福克斯當作最佳選擇。就此而言，墨西哥早在一九八九年總統大選後，變動後的選民政黨認同結構已發生變動。一九九一年、一九九四及一九九九年經過三次國會選舉及一次總統選舉，大致確立二〇〇〇年總統選舉前的政黨認同結構，亦即在墨西哥已經完成政黨重組的過程，在二〇〇〇年總統大選期間，未因候選人評價引發政黨認同發生政黨重組現象。

## 2、國家行動黨總統候選人評價明顯優於革命建制黨總統候選人

國家行動黨的福克斯，以及民主革命黨的卡德納斯，候選人評價明顯優於革命建制黨的拉巴斯迪達，「主要從福克斯與拉巴斯迪達擇其一」或「主要從卡德納斯與拉巴斯迪達擇其一」的兩組選民中。多數選民給予國家行動黨與民主革命黨候選人較高的評價，甚至革命建制黨支持者或獨立選民，因優先考慮候選人評價，轉而支持形象最佳的福克斯。

## 3、候選人評價是造成政黨輪替的因素之一

各黨候選人在選舉過程中，透過不同方法與途徑來提高選民心中對候選人的評價，一方面讓候選人成為競選過程的主角；另一方面，強化候選人評價成為投票抉擇的重要依據。當總統選舉逐漸轉變為以「候選人為中心」，而非以「政黨為中心」的競選模式(Asher, 1988)。藉由電視、網路……等電子媒體快速轉播，候選人本身迅速成為眾所矚目的焦點，國家行動黨總統候選人福克斯會因選民給予較高評價而選擇投票支持，導致墨西哥走向政黨輪替。

## 三、重大議題與政黨輪替

從重大議題這個短期因素可以發現，選民會因重大議題評價影響其投票抉擇，並成

就政黨輪替。

## (一) 台灣

### 1、選民未因期望總體經濟改善，放棄國民黨轉而冀望民進黨

雖然台灣在一九九七年至一九九八年陷入東亞金融風暴，總體經濟因大環境不佳而陷入低潮。但選民回顧一九九八年及一九九九年的總體經濟，雖認為執政黨表現不佳，卻未對選民投票行為發揮影響力。相反地，展望未來經濟發展將會變好，則選民投票行為具有明顯相關，顯示民進黨所提出的施政藍圖吸引部分選民並贊同民進黨的規劃，且在選舉中投票支持陳水扁。

### 2、改革議題讓選民支持民進黨總統候選人

執政黨無力推動重大民生政策，首先，因在執政黨未能有效掌握國會過半支持；其次，因國民黨政權的「黑金色彩」，讓民眾不滿國民黨政權，凸顯出選民對改革的期望。相反地，民進黨所揭櫫的改革議題在本次選舉後期，引發台灣選民眾多的討論與關注，主要針對國民黨長久執政下遺留的問題。本研究發現改革議題與選民投票行為密切相關，顯示選民會因改革議題放棄支持國民黨並支持民進黨取得執政。

### 3、重大議題因素造成台灣政黨輪替

經濟議題與改革議題這兩個重大議題，引起眾多台灣選民關注與迴響，東亞金融風暴雖然獲得控制，顯然與民眾期望有所落差；此外，執政黨之黑金政治所引發的爭議，讓台灣選民寧願放棄支持國民黨繼續執政，反而期盼民進黨取得執政以實現其施政藍圖，並改革國民黨所遺留之黑金問題。



## （二）墨西哥

### 1、經濟議題是引發選民選擇政黨輪替的主因之一

首先，選民回顧過去一年的個人經濟狀況，亦即個體經濟回顧，個人經濟狀況好壞，不會對選民投票行為發揮影響力；其次，選民回顧過去一年整個社會總體經濟狀況，亦即總體經濟回顧，則與選民投票行為具有明顯相關，顯示選民會因對革命建制黨執政下的經濟施政表現感到不滿，引發多數選民選擇支持國家行動黨執政並走向政黨輪替。

### 2、改革議題並未造成政黨輪替

改革議題在本次選舉，是國家行動黨的選戰主軸，甚至國家行動黨與綠黨組成所謂的改革聯盟，期望對革命建制黨所執政的政府進行改革。本研究結果顯示，改革議題與選民投票行為，並未呈現顯著關連性，顯示選民不會因為改革議題，選擇支持國家行動黨取得執政，並完成政黨輪替大業。

### 3、對重大議題的評價是造成墨西哥政黨輪替的主因之一

經濟議題與改革議題都是墨西哥選民關注的重大議題。首先，選民在總體經濟回顧方面，認為總體經濟表現不佳，選擇讓革命建制黨下台；其次，在改革議題方面，雖然引起多數墨西哥選民迴響，並成為國家行動黨與綠黨組成之「改革聯盟」強打的主軸議題。研究顯示，改革議題並非影響選民選擇讓革命建制黨下台的原因。故重大議題中的經濟議題，是造成政黨輪替的主因之一。

## 四、綜合分析

在綜合分析中，首先，將政黨認同分佈變化、候選人評價及重大議題中的經濟評價等三個變數，建構一個簡單模型，比較三個主要變數對選民投票行為的相對作用力；其次，除考慮選民基本人文因素、選民對候選人的情感溫度，更納入重大議題中的改革因素，將上述變數同時投入分析重新建構一個完整模型，藉以比較投入變數對選民投票行

為的作用力大小。

## **(一) 台灣**

### **1、簡單模型**

政黨認同、候選人評價、經濟議題，在簡單模型具有明顯的影響力，三個變數中，以政黨認同影響力最大，候選人評價居次，重大議題中的經濟議題影響力最小，顯示政黨認同、候選人評價、重大議題是影響台灣選民政黨抉擇的重要因素，是造成政黨輪替的主要原因。

### **2、完整模型**

教育程度、政治世代、政黨認同、候選人評價、選民對候選人之情感溫度、改革議題，在完整模型具有明顯的影響力，經濟議題的影響力為其他因素吸收，變數中以政黨認同影響力最大，改革議題居次，政治世代第三、教育程度居第四、候選人因素（候選人評價及選民對候選人之情感溫度）影響力最小，顯示上述因素是影響台灣選民政黨抉擇的重要因素，意即造成政黨輪替的主要原因。

## **(二) 墨西哥**

### **1、簡單模型**

政黨重組、候選人評價、經濟議題，在簡單模型具有明顯影響力，三個變數中，以政黨認同所代表的政黨重組影響力最大，重大議題中的經濟議題居次，候選人評價影響力最小，顯示政黨重組、重大議題、候選人評價是影響墨西哥選民政黨抉擇的重要因素，是促成政黨輪替的主要原因。

### **2、完整模型**

將人文區位變數（年齡、居住地區）、政黨重組、候選人評價、對候選人情感溫度及重大議題投入完整模型進行分析，除經濟議題影響力為其他因素吸收外，各項變數中以政黨重組影響最大，選民對候選人之情感溫度居次，候選人評價第三、居住地區第四、

年齡居第五，經濟問題重要性影響力最小，上述因素會顯著影響墨西哥選民的政黨抉擇，更是造成政黨輪替的重要原因。

## 五、小結

筆者研究台灣與墨西哥兩國在二〇〇〇年完成政黨輪替，從完整模型可以發現具有下列相同與相異之處：

就相同而言，首先，兩國都產生政黨結構變化的現象，在台灣與墨西哥，原有執政黨都曾發生政黨分裂而造成兩國政黨結構變化的現象，主要政黨都由兩黨體系轉變成三黨體系。其次，兩國反對黨的候選人評價較佳，獨立選民受到候選人評價短期因素的影響，選擇挑戰的反對黨候選人。

就相異而言，首先，影響兩國政黨輪替的議題因素略有差異。在台灣，改革議題與經濟前瞻是影響政黨輪替的主因之一；相反地，在墨西哥，經濟問題重要性與否則是影響政黨輪替的主因之一。其次，不同的人文區位因素會影響兩國發生政黨輪替。在台灣，影響政黨輪替的社會分歧主要來自於選民所具有的教育程度及政治世代；相反地，影響墨西哥政黨輪替的社會分歧主要來源為選民的年齡及居住地區。

總而言之，從選民抉擇的角度出發，筆者認為台灣與墨西哥由上述結果可以歸納出四個重要意涵：

（一）執政黨內部分裂即給予在野黨取得執政的最佳時機：在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的選舉制度下，政黨內部分裂，政黨支持者一分為二，反對黨固守既有力量並在三大勢力競爭的賽局，僅需三大勢力間的相對多數即可獲勝，政黨輪替相對容易達成。

（二）執政黨提名非選民心中候選人評價最佳的候選人：執政黨若提名非選民心目中最優的候選人，等同給在野黨獲勝良機，因為在野黨為勝選必定會提名選民心中評價

最佳的候選人，才能擊敗執政黨候選人取得執政權並完成政黨輪替。

(三) 改革議題成爲選戰主軸：二〇〇〇年總統選舉，在台灣，改革因素是主導選戰的重要議題，更是選民投票抉擇考量的主要議題。改革議題不僅是在野黨最擅長的議題，多數選民若願意回應在野黨改革的呼籲，政黨輪替的結果勢必發生；在墨西哥，全國行動黨與綠黨雖共同組成「改革聯盟」，改革的議題亦是選戰主軸之一，研究顯示改革議題卻不具影響力。另一方面，經濟問題仍是墨西哥民衆關心的重要議題，在野黨能呼應選民對於經濟議題重視程度，是促成政黨輪替的主因之一。

(四) 影響兩國政黨輪替的社會分歧具有明顯差異：在台灣，選民所具有的教育程度與政治世代，主導政黨輪替發生的可能性；在墨西哥，選民所具有的年齡與居住地區特質則是影響政黨輪替的重要因素。

## 第二節 本研究的貢獻與限制

### 一、本研究的貢獻

在陳述本文的研究貢獻之前必須說明的是，「大勢所趨」常用以形容人力不易改變的態勢。選舉處於有利於一方的政治氣氛中，另一方要力挽狂瀾並非易事。二〇〇〇年總統選舉前一年，台灣與墨西哥社會內部瀰漫不利於執政黨的氛圍。在經濟上，台灣還深陷在一九九七年至一九九八年的亞洲金融風暴危機；墨西哥則尚未從一九九四年至一九九五年的「披索危機」復甦過來。在社會上，一九九九年台灣九二一大地震所帶給社會內部的不安情緒；一九九八年墨西哥因爲加入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引發就業增加，提高民衆對社會自由化的期望。在政治上，一九九九年台灣，執政黨提名民衆評價較差的連

戰，故宋楚瑜宣布以獨立候選人參選總統大選導致國民黨內部發生分裂（連戰與宋楚瑜）；墨西哥自一九八九年以降，所開展的三黨競爭態勢，革命建制黨提名評價非最佳的拉巴斯迪達，導致左派陣營（革命建制黨與民主革命黨）內部競逐選票。綜上所述，基本上給二〇〇〇年的選戰，譜下了競爭的基調：對執政黨能力的檢驗。這對台灣國民黨與墨西哥革命建制黨勝選的企圖，構成龐大障礙。面臨內憂與外患情境下，國民黨與革命建制黨只能聽任主要反對黨攻城掠地，長久執政的威權政體隨之丕變。

將本文研究成果說明完畢之後，其次將針對政黨輪替對選民行爲、政治民主化與比較政治研究所具有的啓發意義，亦即本文的研究貢獻，試分述如下：

### （一）在選民行爲研究方面

就政黨輪替而言，對選民行爲研究獲得的意義有三：

#### 1、政黨輪替引發的政黨認同分佈動變動

在民主社會，政黨在選舉中的主要支持力量，即所謂的「地盤」或「政治板塊」，相當穩定且不易移動，政黨穩定的支持者，是他們的主要選票來源。原有執政黨（台灣國民黨與墨西哥革命建制黨）與在野黨（台灣民進黨與墨西哥國家行動黨）的基本支持者，是兩國重要政黨的主要支持力量。研究發現在本次選舉原有執政黨得到的選票是長期以來堅定支持的選民。相較於過去政黨得票比例，高於原有執政黨與分裂而出的第三勢力得票總和，顯示部分選民流向主要在野黨。當原有多數黨因爲選票流失而失去多數，新的多數黨形成新的政黨勢力分佈並維持穩定，就可稱此次選舉爲「關鍵性選舉」，換言之，即爲政黨勢力之間產生多數改變的概念。同時強調選民政黨認同清楚的（sharp）與持久的（durable）的重組現象(Key, 1955)。

筆者以 V. O. Key 的概念研究台灣與墨西哥是否完成政黨重組的現象？在墨西哥，一九八九年從革命建制黨裂解而出的卡德納斯，爲凝聚政治勢力所成立的民主革命黨已

經具體成型，並參與一九九一年國會選舉、一九九四年總統選舉及一九九七年國會選舉中更獲得一定的席次與得票率，因此墨西哥在二〇〇〇年選舉前，三黨鼎力的態勢已經相當穩定，顯示已完成政黨重組的結果，故墨西哥一九八八年總統大選可說是具有「關鍵性選舉」的特質。政黨重組正是造成墨西哥政黨輪替的主因之一，政黨重組的起源帶有濃厚的卡德納斯個人色彩。在台灣，一九九九年宋楚瑜從國民黨裂解而出，環繞在他身邊的眾多政治人物係以國民黨的民意代表為主，當二〇〇〇年三月宋楚瑜敗選之後，為凝聚宋楚瑜所代表的勢力，在當年七月份成立親民黨，成為台灣政黨體系中的第三大政治勢力。當宋楚瑜在一九九九年成立服務團隊時，政黨認同分佈已產生明顯變動，由原有國民黨與民進黨對抗的兩黨政治體系，轉向國民黨、民進黨及「新台灣人服務團隊」的三黨政黨體系，亦即為「政黨重組」揭開序幕，且已經造成選民政黨認同分佈的改變，這種政黨認同分佈改變的狀況具有濃厚宋楚瑜個人色彩。

就短期而言，執政黨內部分裂所產生的選民政黨認同分佈明顯變化，會造成執政黨落敗失去執政權；相反地，就長期而言，執政黨內部分裂引發的政黨認同分佈變化，會引發政黨重組，最後造成執政黨失去執政權。由此可知，選民政黨認同分佈產生明顯變化最後都會走向政黨輪替的結果。

## 2、候選人特質、能力及對候選人情感溫度的候選人評價

行政首長選舉最能吸引社會大眾的注意。當選民深受候選人光芒吸引並足以壓倒選民所具有政黨認同或重大議題偏好，則選民會因對候選人人格特質與能力而給予支持，造成人氣王或吸票機的狀況。印證候選人評價因素對選民投票行為的短期影響力，選民評價突出的候選人能夠吸引大部分選民的支持，甚至是決定勝負的關鍵（黃秀端，1996：103-136）。台灣的陳水扁及墨西哥的福克斯具有相同的情況，選民若完全以候選人為選擇標的，則選民不會在乎其政黨標籤或政策議題的主張，選民重視的是候選人的能力、特質、以及過去表現等條件。

為獲得勝選政黨必須提名候選人評價最佳的人選，當執政黨提名人選不佳，在野黨候選人評價又明顯優於執政黨候選人，選民投票支持在野黨候選人的機會大增，相對造成執政黨落敗的政黨輪替結果。

### 3、重大議題因素

民主發展成熟的西方國家，選民以「理性自利」(self-interest)原則出發，決定支持哪個政黨並藉此極大化自身利益。這種『工具性的投票行為』，已經慢慢在台灣與墨西哥發揮影響力(Lau and Sears, 1986)。選民必須能清楚分辨政黨對重大議題主張的差異，或者從施政評價決定投票對象。其中經濟評價與重大議題更是影響台灣與墨西哥選民投票行為的因素之一。兩國同樣面臨經濟困境，經濟變化對選民的影響會對選民投票抉擇發揮影響力。本文研究發現在台灣，相較於其他因素經濟因素雖具有影響力，響力相對偏低；相反地，在墨西哥，經濟因素同樣具有影響力，相較於其他變數，僅「經濟問題重要性」發揮些許影響力。改革議題是二〇〇〇年兩國選舉的重大議題，在台灣因為在野黨積極操作改革議題，是影響台灣選民投票抉擇的重要因素；在墨西哥，研究結果顯示改革因素並未對選民發生明顯影響力。

執政黨施政評價良好讓選民願意支持原執政黨持續執政，反之選民則會選擇支持在野黨執政；另一方面，在重大議題方面，改革議題在野黨主打的焦點是革新執政黨缺失，在此議題選民議題的偏好與在野黨相同，選民支持改革議題選擇支持在野黨完成政黨輪替的結果。

#### (二) 民主化研究方面

在台灣，一九五〇年代國民黨政府一方面控制議會（中央的立法院與地方的省議會），另一方面，則運用權力箝制反對政黨的合法化。一九七〇年代台灣經歷被國際邊緣化的危機，一九八七年民進黨成立後，國民黨不斷受到民主化浪潮的衝擊，為深化統

治正當性逐漸開啓反對黨合法化的空間。經過一連串民主憲政改革，一九九〇年台灣的民主化方步向民主鞏固的路途。在墨西哥，雖然一九二九年反對政黨即取得合法化地位，但自一九三〇年代開始，墨西哥執政的革命建制黨皆利用法規制度嚴格控制反對黨的空間，一九七〇年代末期，墨西哥陸續受到民主化浪潮的衝擊，為讓反對黨取得合法的競爭空間，陸續修改競選法規，一九八〇年到一九九〇年，墨西哥邁向民主鞏固。政黨輪替對於民主化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若能完成兩次政黨輪替，意即步入杭亭頓所謂民主鞏固的基本程序。

台灣與墨西哥自一九八〇年展開的民主化歷程，屬於「由執政菁英帶頭實現民主」的變革模式，透過擴大選民基礎合法化執政權。從選民選擇主要在野黨擔任地方行政首長開始，一黨獨大威權統治的強大力量即步上崩解的道路，更是民主化過程的重要指標之一。當選民願意將中央政府首長職位交付最大在野黨時，透過選舉改變統治者，代表和平移轉統治權，更意味著政黨輪替的起點，更是民主化過程中非常重要的指標，代表台灣與墨西哥在二〇〇〇年已經從民主轉型邁向民主鞏固的第一步。

### （三）比較政治研究方面

政黨輪替是民主社會常見的現象，尤其常見於美國與英國特有的兩黨政治體系，當運用到台灣與墨西哥多黨制國家，勢必要加以修正或擴張政黨輪替的概念與內涵。從比較政治的觀點，政黨輪替在每一個國家都具有不同的政黨體系，其所呈現的政黨輪替方式大多具有明顯差異。尤其在威權體制國家邁向民主體制的民主轉型，都是值得研究的標的。台灣與墨西哥正好是威權體制邁向民主轉型的典型個案。選舉是威權體制執政黨作為執政正當性的方法（陳明通與林繼文，1998）。個案研究是最基本的比較政治研究方式，本文選擇台灣與墨西哥作為研究對象，主要的用意就在於瞭解兩個長久一黨獨大且威權統治的國家，同時完成政黨輪替的主要原因。本文利用比較個案研究的比較政治研究方法，探討兩國在選民政黨認同分佈發生改變所引發的政黨重組現象、兩國選民對



候選人評價的差異，以及兩國選民對重大議題的評價差異，兩國邁向政黨輪替肇因的比較研究正是本文比較分析的基礎。

## 二、本研究的限制

### （一）就比較政治研究的內涵而言

當利用比較方法對政治理論進行解釋與預測政治現象時，若僅從事單一國家個案或少數國家個案出發，將面臨下列限制：

#### 1、研究成果因文化因素受到侷限

單一國家或具有相同文化背景國家間之比較，容易造成研究結果偏差。例如研究美國或加拿大的選民行爲，發現兩國選民社經地位和投票行爲之間並無明顯差異，變數之間的關連性受到質疑。因此，單一國家或相同文化背景國家之比較，可能會得出偏頗的結論。

#### 2、不同研究主題產生互相矛盾的結果

研究者利用不同的研究主題，藉以瞭解不同國家之間政治體系，以及國家內部政治團體的相對影響力，卻產生互相矛盾的結果。筆者認爲會造成互相矛盾的可能原因有二：一是，研究者運用不同研究主題切入，觀察影響選民投票抉擇主因，因切入觀點差異，詮釋角度不一即會造成政治體系變化成因差異，這種差異經常出現矛盾的結果。

### （二）就比較經驗研究方法而言

#### 1、相同的概念卻有不同的意義

比較經驗研究方法，最基本也是最難以處理的問題，是關於社會科學研究的知識論問題。就傳統來說，多數比較政治是基於實證主義立場進行操作。實證主義強調透過有系統觀察、通則化與假設的檢證，找出可以跨越時空，且具有一致性與可通則化的各種變項連結關係。因此利用民意調查的個體量化資料，進行跨國比較經驗研究，本身即是實證主義立場。但社會科學中的實證主義立場，逐漸受到採行相對主義立場研究者的批

判與質疑。相對主義主張世界是一種社會建構的結果，而是且與某種政治現象的關係，並無法獨立存在於其所建構之中。例如相對主義者主張，民主概念並非已經存在或給定，他無法獨立存在於其個人自我經驗，以及個人與社會間的結合關係。因此經濟成長是一種社會建構的產物，在不同的社會中就有不同的成長意義。因此，運用總體性統計研究分析民主與經濟成長之間的關係，效果將非常有限，因在一個多樣的社會建構世界，仍然有一個「客觀實在」(objective reality) 存在。

在這種情形下，並無法解決研究者所面臨的知識論問題，必須承認他們確實存在。完全的實證主義是站不住腳的，而且比較分析研究者必須承認概念的意義與理解，同時會受到研究者本身以及所研究國家文化脈絡的影響 (Collier, 1993: 113)。台灣與墨西哥選民行為研究，其中投票行為研究主要來自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投票行為的主要研究變項，也是從美國的研究中所創造出來，本文借用美國的研究成果，未探討台灣與墨西哥時，同樣就會面臨知識論的問題，台灣與墨西哥確實發現美國投票研究發現中主要變項的狀況。例如：政黨認同這個概念就是明顯的例子，政黨認同在美國的定義，當被延伸應用到台灣與墨西哥時，其面臨的政治體制與政治文化差異甚大，分析政黨認同時，必須承認政黨認同在這三個國家之間所代表的涵義，具有明顯的差異，這個差異受台灣與墨西哥的國家政治體制與政治文化脈絡影響最大。

## 2、測量量尺的不一致性

測量尺度差異可以從兩個角度進行說明：

### (1) 候選人形象評價的題型差異

在台灣方面，分成兩部分，首先，有關候選人形象評價的題目，分別從「政治領導能力」、「品行道德」、「值得人民信賴」、「瞭解民眾需要」、「認同台灣」、「具有親和力」等六個面向人格特質評價與整體評價，請民眾對候選人進行評價；其次，有關候選人能力評價的題目，分別從「促進島內省籍與族群和諧」、「維持政局安定」、「維持經濟繁榮」、

「消除黑金政治」、「開拓台灣國際關係」、「確保台灣安全」、「具有改革決心」等七個面向能力評價，請選民就三組總統候選人進行評價。其中，有關候選人特質中的清廉面向內涵的評價包含兩個面向：「品德」與「誠實」<sup>62</sup>，其主要的目的是瞭解民眾對特定對象的品行道德與誠實印象。台灣問卷是利用人格特質評價中「品行道德」這個面向，詢問民眾對候選人廉正形象的評價，以「1」表示品行道德非常好或非常值得信賴，「4」表示品行道德一點也不好或一點也不值得信賴。在墨西哥方面，墨西哥問卷則從能力與人格特質中，直接利用（誠實）詢問民眾對候選人清廉形象的評價，以「1」表示非常誠實，「4」表示一點也不誠實。一般而言，等級尺度的回答是不能相加，也不應平均。為了符合等級尺度測量不能加減乘除的要求，研究者多半用次數分配與百分比的方式呈現結果。但次數分配與百分比的結果呈現方式，會使得變項間的探討變得瑣碎且複雜。

## （2）為利於跨國分析導致過度簡化

透過經驗研究資料進行跨國性分析，是研究最迅速的方法，必須耗費極為龐大的經費、人力與時間進行資料蒐集的工作。首先，許多研究者已經逐漸感覺到這種研究成本過高的問題，會對學術研究產生資源排擠的限制，實際上的收益並不明顯；其次，研究者開始省察，這種跨國性間的比較研究可能會涉及「概念濫用」（concept stretching）的問題，亦即質疑資料與結果正確性的問題。過度量化並非意味跨國性的比較經驗研究完全不重要。主要提醒的是，這些方法的運用必須謹慎，且研究者必須承認並設法克服概念濫用與過度詮釋的問題。

---

<sup>62</sup> Robert Abelson、Sunsan Fiske 及 Shelly Taylor 等社會心理學家參與美國國家選舉研究（National Election Study, NES）後，建議使用結構式問卷詢問選民對候選人人格特質的題目。這些候選人人格特質方面的題目，試圖建構一個理想候選人與實際候選人的對照測量。測量候選人人格特質的題目有四個面向，共九個特質，分別為：（1）才能（competence）面向：包括學識、聰明才智；（2）效率（effectiveness）面向：包括領導能力、鼓舞民心士氣及勇於任事；（3）廉正（integrity）面向：包括品行道德、誠實度與信任感；（4）移情（empathy）面向：同情心與關心 民眾，如瞭解民眾需要或親和力（Miller and Shanks, 1996; Kinder, 1986）。

### (3) 重視建構資料檢證的研究假設，忽略研究個案本身的特性

研究者喜歡從眾多複雜事件與互動模式中，找出最穩定和無變化的因素，透過比較找出不同國家之間的相似點與相異點。希望透過檢視個案排列來建立研究架構，透過資料檢證與研究假設比較推論出相關的法則，並藉由假設進行內涵解釋。

當研究者想要研究一個國家時，所採取的研究方式若完全遵循理論建立假設，會面臨「見樹不見林」的窘境，因為若一味接受西方的理論，將會喪失自我的創造力，並忽略研究個案本身的特性。<sup>63</sup>

例如台灣的個案中，宋楚瑜「興票案」這個的短期事件，讓四分之一的選民，發生支持對象與投票對象不一致的現象。<sup>64</sup>在一個三強鼎立的選舉中，已經足以影響選舉結果，並成為影響政黨輪替的重大短期因素。然而這因素在比較經驗研究中通常無法呈現出來。

---

<sup>63</sup> Alberto O. Hirschman 指出，John Womack 利用傳記式手法所著作的 *Zapata and the Mexican Revolution* (1968)，細膩的描述墨西哥農民運動領袖的傳記故事，全文圍繞在薩帕塔的人和事，幾乎不做評論，雖沒有運用理論與假設，但當我們讀完這本書對瞭解墨西哥將有更深一層的認識；James L. Payne 的 *Patterns of Conflict in Colombia* (1968) 運用明確的理論與研究框架進行檢證，在一般專業研究中，堪稱代表性著作。Womack 的著作無法符合學術規範的要求，卻能切中墨西哥農民革命運動的來龍去脈；相反地，Payne 的著作則能符合嚴謹的學術規範要求，但對哥倫比亞實際的政治運作則猶顯不足，僅以設定的理論與模型看哥倫比亞，仍有許多的瑕疵與盲點。Alberto O. Hirschman, "The Search for Paradigms as a Hindrance to Understanding," *World Politics*, Vol. 22, No. 3, 1970, pp.329-343.

<sup>64</sup>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九日國民黨前立法委員楊吉雄召開記者會，揭發宋楚瑜涉興票案，指宋子宋鎮遠在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三十日購買 1 億 600 萬中興票券，另外帳戶中仍有一億 4 千多萬。